

少数民族碑刻文化的发展

——以楚雄彝族为例

田占营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2年3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2年4月8日; 发布日期: 2022年5月11日

摘 要

云南楚雄彝族地区碑刻文化蓬勃发展, 碑刻种类有一千多种。楚雄彝族碑文的使用, 对了解古代环保观念、书院制度建设、碑刻史以及楚雄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起源大有裨益。前人对文献碑文的比较取得了许多成就, 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楚雄彝族地区的地方民族史提供了保证。然而, 相关的研究工程 and 实际表现状态还不够深入, 目前很少有学者对楚雄民族的地方史和碑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为了促进楚雄彝族地区引申文献的比较, 深化楚雄地方史研究, 通过对地方志的阅读和对彝族碑刻的现场访问, 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期后期学者收集和比较引申信息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索引, 并促进后续的汇编和写作工作。在对众多碑文进行整理后, 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 并对其时空分布进行调查, 以进一步探讨楚雄彝族碑文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

楚雄, 彝族, 民族文化, 碑刻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Stele Culture

—Taking Yi Nationality in Chuxiong as an Example

Zhanying Ti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 25th, 2022; accepted: Apr. 8th, 2022; published: May 11th, 2022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 culture in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area of Yunnan is booming, with more than 1000 kinds of inscriptions. The use of Yi nationality's inscriptions in Chuxiong is of great benefit to understand the ancient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y system,

文章引用: 田占营. 少数民族碑刻文化的发展[J]. 历史学研究, 2022, 10(3): 103-108.

DOI: 10.12677/ojhs.2022.103016

the history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origin of minority culture in Chuxiong area. Predecessors have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arison of inscriptions and inscriptions, which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us to further study the local ethnic history in the Yi nationality area of Chuxiong. However, the relevant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tual performance status are not deep enough, and few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local history and inscriptions of the Chuxiong peop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arison of extended literature in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region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Chuxiong local history,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through the reading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on-site visit to Yi nationality's inscrip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dex for later scholars to collect and compare extended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follow-up compilation and writing work. After sorting out many inscrip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m and investigate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huxiong Yi nationality's inscriptions.

Keywords

Chuxiong, Yi Nationality, National Culture, Inscriptions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碑刻作为人类重要的纪念物，保存着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史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家研究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参考。云南楚雄彝族地区历史文化悠久，研究楚雄彝族《三府四州方志》及相关史料和田野调查可以梳理楚雄彝族历史上存在的部分碑刻。用这些碑刻镌刻史料，进而探究楚雄彝族地方史的起源与演变[1]。

在相关历史背景下，楚雄彝区碑刻数量在清代迅速达到顶峰，是楚雄彝区碑刻随三国发展的历史丰碑，碑刻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特点。由金石碑刻等记载的楚雄彝地史，根据“金石专志”等金牌的统计，确切时间记载的秦代碑刻数量几乎有 553 段，这些碑刻充分反映了楚雄彝族地区的秦代文化特征。楚雄彝区碑刻上的碑刻，蕴含着楚雄彝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谱系，是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同时也为研究该地区的书法、雕刻水平提供了无数的物证[2]。明代以前，云南地区的碑文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周洪祖《古今书刻》整理了云南地区的碑文，《云南史志》才开始出现了碑文的记载。随着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云南地区的碑刻上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碑刻。从目前的科研进展来看，科研领域的工作仍不系统，大多处于碑刻系统化阶段，对云南地区碑刻的全面深入研究尚未开展，楚雄彝族地区碑刻研究也不例外。在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对楚雄彝族碑刻的内涵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2. 云南楚雄彝族地区碑刻概述

2.1. 碑刻的概念

目前，学界对石碑碑文的定义没有一致的看法，其中典型代表有马衡、陆和九、施蛰存、朱剑心、赵超气、徐自强与吴梦麟、黄永年、毛远明等。虽然他们对碑文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但还是有一些共

同的特点,经过仔细梳理后可以提取出来。就该研究而言,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根据上述学者的观点,题词首先要有坚硬的中间材料(如石碑、塔砖等器具),其次要有影响的手段这里应该增加两点:第一,石头以外的碑刻[3]。有许多携带书面信息的媒体,但很少有媒体可以用来雕刻书籍,以便长期保存。否则,就不会有成就嵌在石头上的说法。因此,从墓志铭的角度来看,可以将石碑、塔砖等文物的碑文符号归入碑文范畴。我们不能忽视塔砖和其他物体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们不同于常规的隐身载体。生态碑文是指碑文类别的分支,主要指碑文本身的内容或功能与环境有关,记载在其上的内容包括相关的环境演变。第二种是现有的碑文形式。第一种形状由鞋垫保存。大多数碑文已被销毁很长时间,因此只能通过摩擦来传递,摩擦是第二种形式。有些文字和摩擦从未保存过,但相关的书面信息可以在传递的文件中找到,这是第三种形式[4]。然而,由于传递文件的缺陷,如输出、遗漏、缺失和不准确,相反,物品和摩擦更值得研究。

2.2. 楚雄彝族地区碑刻的分布

以楚雄彝区刻碑文为研究对象,基本上是指楚雄境内出现的所有碑文、古迹、墓志、山石、砖瓦等碑文,包括自然界的拓荒者碑文和具有编辑作用的书籍碑文。前文中提到的碑刻有三种存在形式,除了石书,拓荒者和书籍也是重要的存在形式。初代碑刻起源于石头版本,当它从石头版本中出来时,它以不同的形式传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扩展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为有些扩展技术水平不高,或者保存不好,研究会带来很多不便。作为一种额外的存在形式,碑刻也很重要,因为手工复制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而且它们的使用需要更多的关注。

楚雄彝族地区的碑刻数量巨大,据统计,对于这 1700 多年来,楚雄彝族地区在方志专著等文献中发现的碑刻约有 1162 段,其实楚雄彝族地区历史上的碑刻数量要大得多,一些常年从事碑刻研究的学者在走访调查全州碑刻数量后认为,“州境内各种古遗迹均不低于万通”,这在陆丰、楚雄彝、武定、耀宁等县普遍存在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大部分碑刻已不复存在[5]。于是,以方专著中记载的 1000 余处碑刻为样本,通过碑名、作品、经书、刻本、材料、字体、时间、大小、地点、书目等要素,整理出《云南省初兴驿碑刻集》,就样本的整体评价而言,已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终可以看出,这些碑刻经过多年的洗礼流传至今。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文碑刻集》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该地区碑刻的时空分布,从而认识该地区的特点以及该地区碑刻发展所呈现的阶段。

2.3. 楚雄彝族地区碑刻的价值与意义

楚雄彝族的碑文涵盖了这一领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法律法规、习俗等领域。许多材料没有记录在移交的文件中,这使得碑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权威性。楚雄彝族地区和作为云南中部的文化中心,见证了明清以来的繁荣局面[6]。即使在今天,楚雄及其周边地区仍然有许多明清碑文。虽然学术界讨论了楚雄人物的碑文和一些具体问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深入。该研究旨在补充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不足和盲点,主要体现在对楚雄和的教育史、环境史、版画史、文学史等问题的研究中。有必要尽可能从各个方面、广阔的领域和多个角度整合对楚雄彝族碑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完善和弥补现代学术研究的不足和盲点,并进一步探讨楚雄彝族碑文的内在价值和,这也是文章研究的意义所在。

3. 楚雄彝族地区环境碑刻的历史演变

3.1. 明清时期楚雄彝族地区环境碑刻概况

元代以前,碑刻数量相对稳定在 15 段以内。从元到清代,碑刻数量呈幂等快速上升趋势,清代达到

鼎盛时期[7]。为了更直观的观察,仔细研究了每个朝代碑刻的年度具体密度,具体的想法是对每个朝代的存在时间做一个分母,对每个朝代在存在期间的碑刻做一个分子,一致地发现每个朝代在清以前存在期间碑刻密度的变化与每个朝代做清的碑刻数量的变化不谋而合[8]。至于民国时期的变化体现在密度上,虽然明代碑刻的数量比民国时期多,但主要原因是其朝代存在的时间更长,这使其在碑刻数量上占了优势,这其实隐藏了民国时期的年比密度远超明朝的原因和手段从这个密度的变化中,我们也看到了,离我们这个时代的密度越低,就越接近我们的现实,毕竟古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战争、风化等因素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碑刻数量越少,离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越小;碑刻数量越大,离我们这个时代越近。

作为清代楚雄彝文碑刻发展历史的鼎盛时期,有必要对其内在原因进行考察。除了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之外,康熙和光绪时期还有两个小高峰。文字碑刻一般只有在有了一定的社会经历后才能创作,而其创作内容主要是成长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在明清时期,随着文字狱的浪潮慢慢退去,碑文创作又开始兴盛起来,并相对于道光时期达到顶峰。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兵锋的混乱,这场浩劫摧毁了楚雄彝族地区的文化,碑刻的创作再次被堵在了较为局限的一定区间里。随着战争的结束,慢慢变得和平,社会逐渐发展,但道光以后出生的创作者却有所不同,他们的成长教育经历总是夹杂着西方文化的影子,对所创作的碑文内容起到直接作用,并在光绪年间再次达到第二波小高峰[9]。如果看清代碑刻的创作,很容易看出,虽然有高峰也有低谷,但其繁荣程度始终贯穿清代。

3.2. 环境碑刻史料内容探析

这些与环境有关的碑文的内容结构有一定的逻辑,大部分主要是为了保护环境而做出了一定记载,搭建环境石碑的大部分原因是受保护的设施出了问题,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恶化,所以才永远刻上石碑,起到警戒的作用。这些碑文在保护森林资源、水资源、地貌布局和界定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纪念碑主体有所不同,但环境保护碑刻的目的基本相同,即防止环境资源被侵入和盗窃。关于禁止在森林中伐木的原因,有很强的一致性[10]。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农林资源,避免水土流失。这种类型的碑文占收藏和排列的绝大多数,时间集中在清代乾隆年间和道光年间。乾隆第四十六年(1781),陆成题词封山育林,以保护龙泉纪念碑,直接讨论了森林与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伐木与保护措施的关系。如果当地森林资源丰富,附近居民将开始肆意砍伐,一旦植被被破坏,生态环境将开始恶化。因此,成文法是在碑刻中通过的,以警告人们,避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11]。乾隆四十六(1781)年,慈溪山、楚雄彝族的僧侣和风俗,共同建立了鹿城山,以保护龙泉纪念碑。纪念碑的主体包括许多寺庙和村庄。目的保护紫溪山附近的森林资源,制定规章制度,对人民进行处罚。在这一方面,它反映了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民间碑文经常在民间冲突加剧后出现,内容主要是劝人改正,以一项森林保护条约达成协议,弥补了官方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力量不足。另一方面,这反映在民间文字中借用国家权力。村民自律手段无效后,往往向政府投诉,希望官方能够对破坏分子采取惩罚措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威来震慑侵权者。

4. 楚雄彝族地区环境碑刻的现代发展

4.1. 当前环境碑刻的技术发展状态

石材雕刻是碑文创作最重要的关键环节之一,雕刻是这方面具体实施和完成的重要因素。楚雄碑刻是楚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碑文雕刻师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碑文的传播。一些碑刻家技术卓群,这使得雕刻在其上的书法笔墨生动,具有优越的艺术价值。一些碑刻家拉很穷,不尊重原文,去书的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书法家、碑刻家与碑文的艺术魅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历代记载来看,碑刻

专著很少,即使在史诗繁荣的宋代,也没有专门的书籍可以介绍。只是在黄四凡编制清朝道光第六年(1826)的版画文物目录时,才出现了一部关于雕刻和研究的专门著作[12]。雕刻属于各种工人阶级的艺术创作,地位极低,因此在官方历史上没有记载。虽然它的名称有时会出现,但历史上没有记载。这种长期忽视版画和研究的现象直到清朝中期才会改变,相关的作品也开始增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刻碑名志没有及时出版,资深学者在分析与查证碑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对于楚雄彝族的人民来说,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楚雄彝族区域目前存在的碑文数量约为 1160 个,而有刻工提名的碑文数量为 40 个,占 3.4% [13]。

4.2. 碑刻刻工与中原文化的传承状态

碑刻的书法水平决定了碑刻的优劣,尽管云南地处边陲,但云南书法却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座优秀的一般书法的丰碑,与雕刻作品的技艺水平密切相关。常说,为此,版画作品不仅要精通书法,还要对文字有所洞察,否则很容易完成一场好的对话。完成碑帖书法或超越文士书法水平的能力,完全取决于雕版的熟练程度。而在完成了他们的碑刻后刻上了他们的信息文末。

现在楚雄彝区发现的碑刻大多是宋代以后的,宋代书体对该地区影响不大,该地区碑刻的书法仍然沿袭了唐朝时期的书法风格,像杜隆义、杨才华等写时期书法的当地人[14]。在大理国时代,佛教在云南中部占主导地位,佛经被广泛复制,而这些选集大部分被晋唐楷体,然后流传到中原,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珍贵的艺术品,这可以从晋唐楷体书体在云南中部的流行中看出。在这一时期,楚雄彝碑刻上也有许多碑刻,并没有显露出书法的影子[15]。

唐宋以来,中原地区的文人群体通过军事运动和战略迁徙涌入云南,对该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中原文化的跨区域影响下,云南碑刻经过多年的洗礼,逐渐融化了中原文化。今天,我们再次揭示楚雄彝族碑文的人文价值只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最初特征,展示楚雄彝族碑文和所蕴含的中原文化的影响。碑文内化的中原文化基因,实际上是汉代以来中原文化软实力对西南边疆地区文化影响的体现,它为中原文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催生了稳定的力量流。

5. 总结

楚雄彝族碑文是楚雄彝族地方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也是传播文献的重要补充。论文主要还是以楚雄彝族碑刻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教育、刻工、家庭等方面入手,了解楚雄彝族地方史的主要情况。至于楚雄彝文碑刻的现状,目前还比较薄弱,楚雄彝文碑刻研究应以个案研究为主。从宏观角度来看,云南楚雄作为彝族主要聚集地之一,它有着数量可观的彝族碑刻。这些碑文为我们研究丧葬史、宗教史、文字史、语言史、风俗史等提供了原始文献。至于道路碑刻,楚雄彝路碑刻是今天人们了解古代交通线路、地形、山川河流、建设水平、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基础。特别是对水利管理碑的考察,不仅可以全面掌握楚雄彝族地区水利部门的建设状况,还可以探索西南少数民族对水利碑刻的管理、桥梁等方面的碑文研究。关于宗教碑刻的探究,我们可以看到楚雄彝族地区佛教、道教碑刻众多,一方面,在碑刻文献的回顾中,可以大体解剖楚雄彝族地区几大宗教的分布;另一方面,学者们往往忽略了宗教碑刻所属的文化圈层的影响,通过它们进行的探险与分析也可以补充佛教、道教等宗教在云南省的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 [1] 彭建成,彭嘉璇.刘锦棠倡修东山书院并置相关碑刻考[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9,36(6):39-43.
- [2] 龚忆梦.舟山东港碑刻考释[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1,38(3):33-37.
- [3] 彭晓君.隋代碑刻书风探赜[J].艺术评鉴,2021(19):43-45.

-
- [4] 赵顺. 基于自适应流形滤波器的碑刻书法图像清晰化分析[J].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 2020, 39(3): 4.
 - [5] 张勇. 露天碑刻类文物保护与展示研究[J]. 卷宗, 2020(14): 369.
 - [6] 苏建功. 河湟文化背景下的碑刻书法文献考究——以瞿昙寺碑刻书法文献为例[J]. 东方收藏, 2021(9): 77-78.
 - [7] 章宇航. 云南“爨体字”的产生及其价值[J]. 大众文艺: 学术版, 2020(5): 262-264.
 - [8] 王惠君. 清代至民国晋北地区山林禁约与纠纷——以宁武清居禅寺碑刻为依据的考察[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3): 5.
 - [9] 李阳洪. 清末民国龙门碑刻书风南洋传播论略——以港澳地区及新马为重点[J]. 中国书法, 2020(12): 157-159.
 - [10] 尤李, 张爱民. 舍利供养与护法——补释云居寺的两方辽代碑刻[J]. 世界宗教研究, 2020(3): 72-83.
 - [11] 李松. 芍陂水利碑刻初探[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6): 14-21.
 - [12] 马一博. 广西横县伏波庙碑刻保存现状调查[J]. 广西博物馆文集, 2020(1): 168-177.
 - [13] 胡梦飞. 明清时期济宁凤台寺碑刻考释[J]. 临沂大学学报, 2020, 42(4): 40-47.
 - [14] 周飞. 清代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以楚雄碑刻为中心[J]. 农业考古, 2015(1): 140-147.
 - [15] 姚四标. 云南楚雄碑刻所见地方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19.